

环境伦理与空间治理专题研究

引文格式: 石宏伟, 郭余豪. 乡风文明建设助推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的现实思考 [J]. 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4(1): 1-9.

乡风文明建设助推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的现实思考

石宏伟, 郭余豪

摘要: 实现乡风文明, 是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提到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目标之一。乡风文明建设实质上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 它既可以作为连接农村基层治理主体与客体的文化载体, 又可以为实现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必要的软环境, 发挥乡风文明“以虚促实”的作用。当前乡风文明建设在助推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虽取得重大进展和显著成效, 但仍然面临农村治理主体缺失、村户间道德情感流失、农民思想文化程度低、移风易俗工作难度大等严峻挑战。鉴于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加强农村党组织的全面统筹能力, 加强农村基层文化阵地建设, 培养农民思想道德修养和法治意识, 制定有效的“选人”“留人”政策等, 是优化乡风文明建设、助推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未来着力点。

关键词: 乡风文明建设; 农村基层治理; 治理现代化; 治理主体; 未来着力点

作者简介: 石宏伟, 江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郭余豪, 江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江苏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创新研究”(21ZZA002); 江苏大学第21批大学生科研课题立项资助项目“江苏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理论意蕴、典型探索与机制创新研究”(21C354)。

中图分类号: D422.62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3969/j.issn.2095-042X.2023.01.001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将乡风文明建设纳入乡村社会发展战略中, 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1]。乡风文明是乡村文明建设的精神内核, 是乡村振兴的文化支撑。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强调, 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农村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中国几千年的农耕文明社会中, 农村社会秩序的维护主要依靠“礼治”的治理模式, 以经过千百年历代相传的传统文化、风俗习惯和历史经验作为价值评判标准。传统“乡风”就是基于这种治理模式而形成的农村社会风气。

2018年,张志强对于“乡风”有三重理解:在农村的生产生活上,乡风是对农村的风俗、民俗文化和社 会风气的反映;在农民的精神风貌上,乡风是对农民的思想认识、价值观念、行为取向、生活方式的反映;在农村的治理基础上,乡风是对一定区域内人们共同遵守的道德理念、传统习惯、生活准则和约定的反映。“乡风”来源于我国城市以外的广大的农村地区。相比于城市,农村社会在人际交往和风俗习惯等方面有着显著特色,譬如在“熟人社会”模式下,人际关系较为简单、淳朴且亲密,强调集体主义精神,热爱劳动、精耕细作、吃苦耐劳、勤俭持家等^[3]。由此可见,“乡风文明”是指农村地区呈现出一种积极向上、步步高升、欣欣向荣的社会状态,农民的综合素质得到全面提高,传统农村社会被赋予新农村、新文化、新风尚、新农民的内涵,主要包括邻里和谐、团结协作、崇德向善、勤俭节约、艰苦奋斗、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等要素^[4]。由于几千年的封建思想根植于广大农村中,农村社会“重经济、抓生产”,忽视科学文化和技术应用。进入现代社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思维的进步,“乡风文明”又增加“崇尚科学”作为重要补充。至于“乡风文明建设”,就是要将“乡风”转变成一种“文明”。

乡风文明是乡村治理的文化支撑,是乡村自治的历史基因,是实现乡村和谐稳定的重要保障。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党中央再次提出“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5]等目标要求。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期,农业农村的现代化离不开农村社会风气的进步和农民精神文明的提高。乡风文明作为一种文化载体,既连接着农村基层治理的主体与客体,又充当着评价和优化农村基层治理状况的重要指标。因此,新时代下如何高质量推进移风易俗,培育良好的乡风民风,提升农民精神风貌,助力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无法规避的现实问题。

二、乡风文明建设对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实践价值

“乡风文明”是我国广大农民群众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精神心理文化、思想道德品质、生活习惯、社会民俗风俗等的总和,且在一定时间或范围内被人所推崇和模仿。推进乡风文明建设能够为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必要的软环境。文化强则农村强。农民是农村基层社会的治理主体,其整体素养的文明程度直接影响其治理观念和行为。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推进乡风文明建设的根本方向和目标。2020年两会指出,农民不光要生产生活脱贫,还要精神世界脱贫,可见乡风文明建设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唯有抓好乡风文明建设,将文明的种子播撒在农村社会中,才能发挥乡风文明“以虚促实”的作用,才能为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化解更多的障碍、增加更多的动力。

第一,乡风文明中的“团结协作”有利于引导农村基层“自治”,以激发农村基层治理主体参与治理的积极性,凝聚乡村力量。中国自古就是乡土中国,农村的基本形态表现为“熟人社会”,农民们都聚集在有限的空间范围内,其生活作息、生产活动基本高度一致。他们在相邻的土地上耕种,在同一条乡道上行走,在同一条江河中饮水,在同一段时间内休养生息,但凡遭遇河道堵塞、田路毁坏和房屋倒塌等天灾人祸时,也都集体出工,团结协作,共同解决。这种具有强烈集体观念和团结互助精神的乡风文明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孕育而成^[6]。此外,中国传统农村存在较大的地域差异,无论是城乡之间,还是东西南北之间,文化的差异是要求“郡县以下皆自治”的主要原因。千百年来,在广袤的农村社会中,农民们的团结协作和集体观念形成一种独特的“契约精神”,旨在互相劝勉共同遵守。村规民约就是这种“契约精神”的载体,延伸了

法治的内容,以和平方式治理乡土社会,维护村民利益。进入现代社会后,农村集体经济的快速发展,不仅得益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同时也得益于乡风文明体系下的乡村共同体意识。农民既是治理现代化的受益者,也是参与农村基层治理的重要主体。仅让农民的钱包鼓起来,没有文明乡风的催化和引导,农村社会很难结成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农民将缺乏参与村庄治理的积极主动性。要充分利用和发扬传统乡风中的“团结协作”和集体主义精神,团结农村社会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巩固乡村治理共同体,集思广益;重新拿起村规民约,通过集体参议、立约,将同心同德、各守成规、不得违背等内容再次列为约束日常生活的原则,让乡约成为填补法律空白的“准法律”,打造真正的“村庄治理共同体”。只有这样,才能助推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在村民的自觉行为和主动参与中前进。

第二,乡风文明中的“崇德向善”有利于维护农村基层“德治”,强化农民群众的自我约束能力。基于“熟人社会”的模式,中国乡村社会也是一个“人情”社会。中国农民的性格极其淳朴,村民之间的人际关系简单,彼此相互了解、信任,社会环境总体上相对和谐、保守。传统的乡村社会存在许多非正式的制度资源,村民们的行为习惯、生活方式也更多强调共性,因此孕育出许多具有普适性且能运用到社会治理领域的道德元素,譬如邻里和谐、患难相恤、勤俭节约、自强不息、天人合一等^[7]。尽管“追求共性”抑制了乡村社会“个性”与“创新”的发展,但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文明程度普遍不高的农耕社会,共同认可的道德准则、是非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物质与精神世界的距离。同时,农耕文化、乡土文化、民俗文化来源于乡村生活,是以“乡贤”为主要代表的劳动群体智慧的结晶。新时代下,充分利用传统农村“追求共性”“崇德向善”的乡风特质,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其中,培育广大农民群众的价值共识;鼓励乡贤回流,培育新乡贤,增强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发挥“德治”的教化作用,更有利于促进乡村的和谐稳定。

第三,乡风文明中的“礼法结合”有利于强化农村基层“法治”,促进农村社会长治久安。纵观千年治理历史,“礼治”是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治理思想的高度概括。“皇权不下县”始终都是古代皇室与政府对基层的主要态度。政府对农村的治理工作集中于税收、征兵、赈灾等,农村重大事务的处理和社会秩序的维护主要依靠各地家族的族长和乡绅。因此,传统乡土社会是在“自治”基础上的“人治”社会,推崇“先家规,后国法”。即使法治在传统乡村治理中地位不如德治、人治,但在官箴书、家法族规和乡土治理等文献中均能察觉统治者对国法的重视,国法代表整个国家的共同意志,是相互认可的文化和道德,要求乡土社会也必须遵守国法。进入现代社会,由于城乡之间交通和通信的便利化,中国农村与外界的联系愈加紧密,城市中各种错误思想潮流涌入农村,如利己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都严重影响了农民思维的辨识性和思想的纯洁性。尤其是功利化的价值取向扭曲了村民的正确价值观,热爱劳动、吃苦耐劳、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等优良民风受到侵蚀,各种坑蒙拐骗事件屡见不鲜。部分经济实力提升的农民为满足所谓多样化的生活需求,沾染上了各种恶习,如酗酒、赌博、吸毒等。我国乡村地域辽阔,社会关系复杂,治理难度较大。因而,在基层政府的有序组织下,挖掘乡风文明中“礼法结合”“引礼入法”等特质,借助地方乡贤的威望,复兴家风家训、村规民约,将法治作为村民日常生活的最低约束,打击各种违法犯罪行为,用法治净化乡村社会风气,描绘乡村文明新面貌,才能维护农村社会的长期和平稳定^[8]。

此外,不同地区的乡风文明载体各有其特色,以乡风文明建设推进各地挖掘农业产品、乡土文化等资源,比如开发古村落、传统手工艺、民谣、戏曲等,以壮大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不

仅能保障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经费稳定,还能提高村民收入,实现村民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双丰收。

三、乡风文明建设的不足制约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

党的十九大以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我国乡风文明建设在助推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取得了重大进展和显著成效。比如,在思想观念方面,农民的思想逐渐由封闭走向开放,农民法制意识逐渐增强,农民行为趋向文明化;在环境方面,村民乱扔垃圾现象有所改善,农村卫生环境脏乱差、路面坎坷不平状况得到有效治理;在日常生活方面,高雅文化艺术的下乡,农家书屋、文化广场和体育健身设施的建设,为广大农民带来了高品质的精神享受;等等。然而,实现乡风文明是推进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的重难点,农村人口结构失衡、传统道德情感失忆、农民整体教育程度低、移风易俗难度大、村干部素质不高等问题仍然是其制约因素。

(一) 农村人口空心化严重,乡风文明建设主体缺失,治理动力不足

农村“缺人”是乡风文明建设的最大瓶颈^[9]。在传统的农村社会中,村庄大多以家族的方式存在,交通不便利,人口流动较小。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动力牵引下,加之城乡二元结构导致的城乡资源配置不均衡,农村人口流动日益频繁,大多数青壮年劳动力进入城市,农村整体布局随之改变。农民既是乡风文明建设的主体,又是基层治理的主体。然而,许多农村已经变成“空巢”“半空巢”村落,人口的空心化使得中国广大的农村丧失了发展的后劲和活力。村内的留守老人,一部分仍在忙于生计,一部分家境较好的整日聚集闲聊打牌,也无心投入乡村治理事业。留守在家的妇女,要么忙于养老扶小,要么奔走打零工,基本不会主动参与村庄公共事业。乡村治理主体的缺位,加大了乡风文明建设乃至整个乡村振兴工作的开展难度。由于没有主劳动力人群的参与,仅靠老幼妇孺的力量推进乡风文明建设,“乡风文明的继承和弘扬未来靠谁,乡村治理未来靠谁,乡村土地未来靠谁种”等问题变得愈发急切和严重。乡村人口的空心化,造成了经济空心化、政治空心化、乡贤文化空心化、公共服务空心化、家庭功能空心化、村委会“空巢”现象,乡村治理变得无人治理、无力治理。

(二) 村户间道德情感逐渐流失,乡风文明建设积极性低,治理阻碍性大

道德失忆、情感冷漠的双层叠加,透视出当下中国乡村的人性变迁^[10]。道德情感冷漠,指个体虽具备一定的道德素养,但对现实生活中所接触到的社会现象保持“绝缘”状态,对道德问题和道德召唤毫无反应。这样的群体在乡村中主要分为两类:冷漠化的旁观者和冷漠化的受助者。关于旁观者冷漠,最典型的例子即是“看客”现象——对身边种种不道德的人和事采取事不关己、麻木、自私等态度。从社会学角度来说,这被称为“社会发展畸形”。社会由人类群体组成,人是社会的人,能够去改变社会的也只能是人,有相当一部分人变成“看客”,社会自然成为无情社会。旁观者虽没有主动危害他人,但其眼冷、心冷足以让人心寒,这和“不道德”并无不同^[11]。关于受助者冷漠,最典型的例子即是“帮人反害己”现象。村民们在日常生活中出现矛盾纠纷,街坊邻里基于好心帮忙调解,但是在此过程中,常有第三方无辜受害、受牵连的不幸事件发生,这种“好心反而害自己”更会助长“道德冷漠”之风。此外,受助者冷漠现象还体现在,接受他人帮助后没有感恩之心。比如在接受政策扶贫、政府特殊救助、企业家捐款后,有少数人认为其理所应当,从而形成一种“等靠要”思想。村民之间的道德失忆、情感冷漠,邻里之

间的关系恶化,破坏了“乡村伦理共同体”意识,造成了乡村公共伦理秩序的失衡和断裂,“道德示范”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的“调解乡民冲突”功能处于“空洞”状态,村民的“少说为佳”“明哲保身”引发了乡村治理热潮中的“冷场”。

(三) 农民思想文化程度偏低,乡风文明建设后劲不足,治理现代化进程慢

农村的主劳动力投入到城市建设,而留守在村落的农民大多是文化程度不高的。我国农村社会发展至今,农民文化程度整体偏低依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12]。这类群体在应对家里家外的各类事务时,由于自身见识的局限和法律意识的淡薄,习惯用“旧思维”“旧观念”处理问题。比如盲目求富,嗜赌成性;索要天价彩礼;讲究风水,反对公墓,执意建造“风光墓”;生病不求医,不信科学,相信“巫术仙术”,请神作法,装神弄鬼;利用暴力手段解决矛盾纠纷;等等。少数农民家庭思想观念仍然有偏差,虐待老人、弃养老人、家暴妻儿、重男轻女等不道德行为时常发生^[13]。以上种种皆在毒害村民的身心健康,侵蚀乡村治理的既有成果,进而影响村民在参与治理过程中的价值观。此外,农民思想文化程度偏低还体现在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淡薄方面。生活垃圾随意丢弃,污水乱排乱放,露天茅厕臭味熏天。生产工具和废弃家具堆放在乡间要道,影响交通顺畅和乡村道路整洁。肆意开垦土地,焚烧秸秆,滥用塑料地膜。部分依山而居的村民,随意捕食山林野生动物。这样的生产生活方式,既不符合建设绿色乡村的理念,又会制约乡村生态环境治理的成效。

(四) 农村“客事”活动频繁,乡风文明建设成效低,治理工作量大且复杂

推进农村移风易俗是重新营造农村社会勤俭节约、崇德向善等氛围的关键环节。乡风文明建设的效果如何,关键是看村庄内的陈规陋习是否得到有效纠治。中国农村“好”办宴席,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客事”呈现出了新的特点。第一,除红白事请客、满月请客、“逢十”生日请客等传统“客事”外,又有了新兴的“客事”,如升学请客、入伍请客、入职请客等。第二,“客事”标准提高,投入资金越来越大。“排场”成为当下“客事”的衡量标准之一。餐桌上除了丰富的菜品之外,还配备高价香烟、高价酒。请客范围较大的红白喜事宴中,部分农村地区由于家族的庞大,少则五六十桌,多则上百桌。频繁的、大规模的“客事”不仅给广大人民增加了沉重的经济负担,还造成了社会的严重铺张浪费,甚至还促使了“客事”活动的恶性循环。此外,与“客事”紧密联系的“天价彩礼”“礼金攀比”等陋习也造成了“因婚返贫”“光棍村”“人情礼金还不起”等现象。“移风易俗,节俭办席”是当前农村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然而,“客事”是刻在中国人民骨子里的习俗,本身没有问题,然而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客事”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家庭聚会,而是攀比成风,铺张浪费,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极不吻合。农村社会每天都有各种“客事”,村干部劝诫工作难开展、难深入,以致大操大办、过度浪费的现象仍未得到有效整治。

(五) 村干部群体平庸化,乡风文明建设形式主义现象严重,治理实力弱

农村干部是推进乡风文明建设和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领头羊。然而,部分村干部只注重个人利益,长期抢占村内公共资源,比如长期把持基层基础设施项目资金、占用村内低保户名额等。还有部分村干部凭借自身地方宗族势力的强大,操纵农村基层民主运转,在选举过程中大肆买票、拉票。在相当一部分农村地区,基层村民自治只体现在村委会民主选举中,随后的各种民主决策、管理、监督都处于若有若无的状态,基层乡风文明建设等工作被“村霸”和别有用心心的“黑恶势力”所操纵。推进乡风文明建设,参与乡村治理不仅仅是“村两委”的职责所在,也应是村民们共同的政治生活内容。乡风文明建设最大的原则就是要尊重民意。此外,有些村干部坚

持将“经济建设”放在农村发展的第一位,忽视乡风文明建设;还有一些村干部受制于自身文化程度和治理能力的薄弱,在担任村内各项事务执行人期间,群众动员能力欠缺,法治能力不足,应急能力弱,小作为甚至不作为,工作态度及其表现不尽如人意^[14]。这些经村民选举而被委以重任的村干部,在应对上级检查时,更多表现为“形式主义严重,治理仅浮于表面”,比如对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敷衍了事,低质量推动“厕所革命”,仅将五花八门的乡风文明标语粉刷上墙,不做实质性的宣传,大搞“形象工程”“面子工程”“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等等。因此,在以乡风文明建设助推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急需一批有文化、有能力、有斗志、会做事、干实事的人担任农村治理“领头羊”。

四、以乡风文明建设助推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未来着力点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实现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保障,实现有效治理是乡村振兴的基础^[15]。如若以乡风文明建设助推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则必须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强化农村基层文化阵地建设,强化自治、法治、德治全面结合,强化农村基层治理人才队伍建设。

(一) 强化农村基层“两委”班子建设,提升党组织的全面统筹能力

党的百年实践证明: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没有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全面引领,推进移风易俗、以乡风文明建设助推治理现代化将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农村党组织必须总揽全局,把握农村发展方向,提高自身全面统筹能力^[16]。党组织应紧跟党中央的思想步伐,积极学习和贯彻党中央的各项会议精神,将最新的中央指示和政治理论通过讲座会议、政策宣传手册等方式传达给村内每一个村干部、党员和村民,提升党员群众的政治素养,激发党员干部的工作干劲和积极性。“村两委”要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坚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的原则,顺应本地村民群众的要求和期盼,制定出周全、严密、科学的政策执行方案。坚持从实际出发,对不同的措施和不同的人群进行分类指导。在意识形态和思想道德方面,必须采取一致的工作方案,引导村民理解中国共产党获得执政地位的历史必然性,坚定村民对党领导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在风俗习惯方面,对于农村的少数民族村民应该根据党和政府统一给出的指导意见来执行相应的方案。移风易俗,最主要的就是摒弃那些不健康、不文明、不合时宜的旧习陋习。与宗教信仰相关的、烦琐的习俗可以鼓励村民自己简化。此外,“村两委”还要注重“文明乡风、淳朴民风、良好家风”的培育,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深化民族团结教育,强化集体主义意识,积极开展文明家庭、“好家风”示范户、星级文明户、最佳村民等评优活动。

(二) 强化农村基层文化阵地建设,培养农民思想道德修养和法治意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和公共文化建设”^{[17]125},“改善农民精神风貌,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17]125}。以乡风文明建设推动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既是推动乡村治理重心下移的具体体现,又是改变中国传统社会一元化治理模式的必然选择。对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农民群众,乡村治理重在“德治”,以道德文化润民心。第一,积极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坚持以党的最新理论思想武装农民头脑,深入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强化村民的“四个意识”和“四个自信”,提高村民思想政治觉悟^[18]。通过政策标语上墙、政治理论宣讲入户、村委会室内课堂宣讲、文艺展演等形式,逐步将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生态文明、法治观念等融入村民日常生活中。第二,大力复兴优秀传统乡土文化。挖掘、继承、发扬良好家风家训和传

统农耕文化中的优秀思想品质、道德情操、人文精神。培养农民务实、吃苦耐劳、勤劳致富、艰苦奋斗的优良品质。第三,反对落后的封建文化。坚决摒弃内外有别、重男轻女、男尊女卑、愚忠愚孝、宗法治人、求神占卜等旧道德和旧礼教,大力弘扬现代科学思想,普及社会主义法治观念,培养村民科学精神。第四,加强农村文化阵地建设。坚决抵制洋奴文化,反对崇洋媚外,坚持办好本土传统节日,保留并传承乡村独具特色的节日庆祝方式。规划乡村文化服务中心,设立读书角,建设农村民俗文化室、体育活动室,积极开展文艺汇演,定期放映优秀题材电影,重视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鼓励村民加强体育锻炼。第五,重视农村青少年的成长。全面加强九年制义务教育,提升农村青少年对流行文化的辨别能力,加强对青少年的心理教育,引导青少年积极向上成长,坚定的理想信念。

(三) 强化农村基层生态文明建设,打造乡村人居环境新面貌

推进农村基层生态文明建设,既是强化村民“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重要工程,又是推进农村治理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广大农村如若丢失“绿水青山”,何以寻来“金山银山”^[19]。第一,强化生态屏障建设。中国的森林、河流、湿地等主要集中在农村,要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因地制宜,坚持实施植树造林工程,增加农村荒野的绿地面积。第二,深入开展村庄卫生环境综合整治。对垃圾乱丢、柴草乱堆、家具农具乱放、饲料粪肥乱置等现象进行纠治,对家禽圈窝私搭乱建、生活污水乱排、肆意开垦土地等违法违规行为予以制裁。第三,开展生态文明教育。开设生态环境保护、人与自然命运共同体等主题教育宣讲课,集中讲解生产生活中极具代表性的正反案例,积极推动垃圾分类教育,鼓励村民减少对农用地膜、农药化肥和塑料袋的使用量,不随意焚烧秸秆,积极响应垃圾分类治理的号召,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做高素质农民。总之,以乡风文明建设提升村民环保意识,教化农民尊重自然发展规律,自觉保护乡村生态,自觉美化村容村貌,进而可以简化基层工作人员在生态环境治理上的工作,早日实现“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的目标。

(四) 强化自治、法治、德治全面结合,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村规民约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紧迫任务,重点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0]村规民约是中国乡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传统基层社会中充当着农村地区特有的非正式制度,在遏制社会不良风气、促进乡村内部和谐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村规民约并不具有法律的宏观性和整体性,但可以弥补法治的不足,深入到农村治理的各个方面。然而,如今仍然被继续保留使用的村规民约还存在与现实状况不符等问题,比如部分规范内容与法律有冲突、实施效率不高等。新时代的村规民约必须充分体现“自治、法治、德治”三者结合,必须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其中^[21]。村规民约仅仅是法律的补充,其地位绝不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村两委”在制定乡规民约的过程中,既要接受上级部门的严格把关,又要结合村庄实际情况,同时保证其制定程序的规范,符合“公平、公正、公开”原则。对于移风易俗相关条款的制定,要坚决打击宗族黑恶势力,借助乡风文明建设的契机,大胆整治农村存在的痼疾。总之,村规民约必须在遵守法律的基础上,凸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诚实守信、爱党爱国、遵纪守法、崇尚科学等精华融入村民的血液里,让村规民约重新在新时代乡村焕发出强大生命力。

(五) 强化农村基层治理人才队伍建设,制定有效的“选人”“留人”政策

人才是推进乡风文明建设和农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资源。乡风文明建设的主体,除了广大的农民群体外,还包括“村两委”干部、农村企业家、乡贤、乡绅等少数精英人群。然而,农村社会急需一批有知识、懂技术、肯干事业的优秀人才。推进移风易俗,优化农村治理,不仅要注重

人才数量的增加,还要注重人才的选拔、培养和扎根^[22]。第一,鼓励引导从农村走出去的大学生返乡,支持家乡建设。优化农村基层治理,首先就要让农村的事由生于本土本乡、热爱父老乡亲,且有本事、有能力、有责任心的人来管。第二,充分发挥精英人士在乡风文明建设中的作用。像乡绅、已退休的干部、党员同志、退伍军人、成功企业家和返乡创业者等对新事物有着强大感知力,在村庄中知名度较高,被许多家庭所仿效的对象,在推进乡风文明建设中发挥着特殊功能。“村两委”对这类人群要重点做好思想工作,适当安排工作职务,引导其积极参与乡村治理,对表现优异的可以给予实质性的奖励。其中,对新兴的创业者要提供相应的资金支持和政策引导,为其搭建便利的服务平台,努力将村内民俗产品、文化产品、农产品与创业者产业相融合,帮助相关产品寻找销路,从而吸引农民返乡就业,吸引更多致富能人、大学生人才返乡大展身手,以缓解农村人口“空心化”现象^[23]。总之,农村基层治理人才绝不仅限于村干部等人,广大的青年群体都是农村未来建设的主力^[24]。“村两委”要完善相应的人才福利待遇,在村干部招考上给予适当的政策倾斜,从“待遇留人”“政策留人”“情感留人”等方面入手,激发知识青年的斗志,为乡风文明建设、基层治理现代化、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五、结语

乡村之美,美在淳朴的乡风民风、美在浓厚的文化氛围、美在和谐的社会关系、美在怡人的村居环境。乡风文明建设是一项涉及精神文明建设的复杂工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17]123},“特别要注重提升农民精神风貌”^{[17]122}。文明乡风的培育有助于农民发扬传统文化中的艰苦奋斗、任劳任怨、勤俭节约的优良品质,从而自觉摒弃好逸恶劳、得过且过、坐享其成等思想。广大农村地区的和谐稳定关乎整个国家社会的长治久安,以乡风文明建设助推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其目的在于改变人们过时的生活方式,纠正人们传统的陈旧思维、错误观念,营造文明守法氛围,调和冷淡的邻里关系,缓解紧张的干群关系,进而凝聚农村共同体意识,为促进农村治理现代化提供动力。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32.
-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9: 1.
- [3] 张秀梅. 聚力乡风文明 助推乡村振兴 [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8-06-13 (7).
- [4] 韩永莲. 河北省乡风文明建设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D]. 石家庄: 河北师范大学, 2018.
- [5]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44.
- [6] 朱志平, 朱慧劼. 乡村文化振兴与乡村共同体的再造 [J]. 江苏社会科学, 2020 (6): 62-69.
- [7] 陈莉, 曹莉莉, 何怡婧. 新时代乡村文明建设中德治的路径建构 [J]. 安徽农业科学, 2021, 49 (17): 255-258.
- [8] 徐越.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乡风文明建设 [J]. 红旗文稿, 2019 (21): 32-34.
- [9] 许佳君, 张梦. 当前中国农村人口空心化现状及治理路径 [J]. 湖北农业科学, 2020, 59 (19): 208-210.
- [10] 向玉乔. 道德记忆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0: 15, 42.
- [11] 吕佩东. 乡村社区情感流失探究: 以甘肃省泾川县南河村为例 [J]. 天水师范学院学报, 2014, 34 (3): 52-57.
- [12] 蒙象飞. 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现状探析 [J].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21 (11): 17-24.
- [13] 杨增崇.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的移风易俗: 现实问题与积极进路 [J]. 贵州社会科学, 2021 (9): 147-154.

- [14] 耿羽. 乡村治理中形式主义的新表现及治理路径 [J]. 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 2020, 42 (6): 80-87.
- [15]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 [N]. 人民日报, 2018-02-05 (1).
- [16] 韩广富, 刘欢. 新时代农村基层党组织推进乡风文明建设的逻辑理路 [J]. 理论探讨, 2020 (2): 137-143.
- [17]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9.
- [18] 于健慧. 党建引领乡村治理: 理论逻辑及实现路径 [J]. 西北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2, 59 (1): 50-57.
- [19] 廖和平, 文成豪. 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问题及对策 [J]. 常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1, 22 (2): 54-60.
- [20] 习近平. 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 [J]. 社会主义论坛, 2019 (7): 4-6.
- [21] 金丽馥, 王丹萍. 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路径探讨: 基于苏北农村的实证分析 [J]. 法治现代化研究, 2022, 6 (2): 100-109.
- [22] 于法稳. 新农村乡风文明的时代特征及建设路径 [J]. 人民论坛, 2022 (5): 29-31.
- [23] 郭余豪, 石宏伟.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业特色小镇发展路径优化研究 [J]. 改革与开放, 2022 (16): 42-47.
- [24] 米华, 王永. 乡村振兴战略下乡风文明建设的内在目标论析 [J].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1, 24 (6): 121-128.

Realistic Thinking on Promoting Modernization of Rural Grassroots Governance by Rur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Shi Hongwei, Guo Yuhao

Abstract: Achieving rural civilization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goals of implementing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mentioned in the report of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Rur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s essentially the core of rural spiritu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which can not only be used as a cultural carrier connecting the subject and object of rural grassroots governance, but also provide the necessary soft environment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grassroots governance, and play the role of “promoting the real with the virtual” of rural civilization. At present, alth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civilization has made great progress and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grassroots governance, it still faces severe challenges such as the lack of rural governance subjects, the loss of moral emotions among village households, the low level of farmers’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education, and the difficulty in changing customs. In view of the fact that the improvement of social civilization is a slow process, strengthening the overall planning ability of rural party organizations, enhancing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grassroots cultural positions, cultivating farmers’ ideological morality and awareness of the rule of law, and formulating effective “selecting talents” and “keeping talents” policies are the future focuses of optimizing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civilization and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grassroots governance.

Keywords: rur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rural grassroots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of governance; governance subject; future focus

(收稿日期: 2022-09-15; 责任编辑: 晏小敏)